

闲话保安

郎清



赵云才摄

被遗弃的“保安大河”

榆谷被称为“金色谷地”其实是缘于“两山一水”。“两山”是指夏琼山和阿米德合隆山。这两座山由南向北延伸,形成一个由高到低的天然阶梯;“一水”是指保安大河。它源于夏德日山,河的上游段称曲玛日河,进入麦秀林后称麦秀河,中下游经“保安四寨子”、麻巴(意为下游)到野雀峡为止叫保安大河(古时亦称为野雀峡河)。保安大河流域面积有4960平方公里,全长156.8公里,在尖扎昂拉汇入黄河。

为什么叫保安大河,而不直接叫保安河呢?这是因为与保安大河相对应的,还有一条保安小河。保安小河源自古城南莲花山东西两侧的红泥沟与稍湿河滩,全长约20里,汇入保安大河。

据《循化志》记载:“保安大河,亦曰野雀峡河,源出厅属合儿番寨之素古山。北流经野雀峡塘东、吴屯西、李屯东、李屯东、脱屯西。”这也就是说,保安大河的取名并不是特指保安镇的大河,它是一条属于泛保安人的大河。保安大河流域的保安城内村、城外村、下庄、军队、新城及吴屯上下庄、李屯(年都乎)、李屯(郭麻日、杂撒日)等村寨,过去泛称为保安,居住在保安大河流域的人叫保安人。

自古以来,保安作为中央政府在榆谷地区的惟一军事据点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中心,它的威势覆盖或辐射黄河南部地区。自明朝重建保安城后许多地名因此而被冠以“保安”二字,比如保安堡、保安四寨子或保安四屯、保安古城、保安都司衙门、保安总爷、保安副爷、保安千总、保安社火、保安人、保安话、保安马场、保安大河……因为“保安”历史悠久,名气很大,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省内外只知“保安”而不知有其它地方并非奇闻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有关图书资料、地图画册、报刊杂志以及政府文件中广泛使用保安大河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随着隆务镇经济建设及民族文化建设的需要,保安大河渐渐被隆务河替代,野雀峡被隆务峡替代。进入二十一世纪后,保安大河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直至被人们完全遗忘。

时下,许多城市为提高自己城市的知名度、美誉度和历史深度,竭尽全力恢复古城名,比襄樊已经改回襄阳,长安大有替代西安之势……在此大背景下,保安大河这条沿用了千百年的河名被中断或更改,有时候确实让人很无奈。抛弃历史深度的文化符号,中断自己辉煌的历史名片,难免让人惊讶、困惑

和迷茫。

被误解的“脱寨”

生活在保安大河流域的兄弟民族把保安古城称之为“脱家”。那么,这个“脱家”是少数民族固有的词汇,还是汉语名词的音译?

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询问过许多少数民族朋友,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“脱家”在少数民族词汇中的来历,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有什么具体含义。那么地地道道的“脱家”人知道“脱家”的真正含义吗?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含糊地引用一个错误的传说,表示“脱家”的意思是居住在高处的汉人。

真相不明以前,往往会有各种版本的传说进行有意无意的口头创作。经过传承、转述、加工、传播,以讹传讹,以至于许多人以这个美丽的传说为依据,除了“脱家”外还创造出了诸如“妥加”、“托加”、“妥家”、“托家”等等众多词汇。更有甚者,民间版或正式版本的文史资料中还赋予其新意为“居住在高处的中原人”。

提到“居住在高处的汉人”和“居住在高处的中原人”似乎可以找到一点依据,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——铁城山雕窠城。这一点,在有关史料中已有明确记载。

早在唐宋时期“脱家”人的祖先确实居住在铁城山的雕窠城里,元明清时期铁城山还有驻军把守。但这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并不足以说明“脱家”的真正含义就是“居住在高处的汉人或中原人”,因为“脱家”的先人最初居住在保安河中游西侧的平地里。根据有关文史材料不难看出,两汉、两晋、南北朝时期,“脱家”的先人生活在互助滩的榆谷城里。这是一群随赵充国老将军开发河湟谷地的部队,他们奉命驻扎在保安河中游的平滩上“筑城屯守”,成为了最早进入保安河流域的屯垦军人。唐文宗开成四年(839年)保安河流域发生了一场大地震,野雀峡(现称为隆务峡)发生崩塌,继而形成堰塞湖,生活在榆谷城里的人们被迫搬迁到了地势较高的铁城山(也叫二郎山)上,修筑了一处雕窠城(也称铁城)居住。时光跨越到了元朝,国家一统,战事不再,生活在雕窠城里的人们在东山山麓下夯土板筑了低矮土墙小城,这儿成了雕窠城居民的集体畜圈——圈养东山上放牧的牛羊骡马。随着雕窠城人口和牲畜的不断增加,小城里实在无法容纳那么多的牲畜。渐渐地,雕窠城里的人以畜圈为基础,修筑了供人居住守护牲畜的简易房屋。明永乐九年(1411年)设立“保安四

屯”后,“脱家”有了一个正式的官名叫脱屯。以羊圈起始的脱屯,在明万历二年(1574年)由四屯军民合力重建,又有了一个“保安”的官名。城内原有居民在重建保安城时搬迁到保安城北,仍沿用着脱屯旧名。

在梳理了“脱家”的名称演变后,我们不妨从这个名称的来历上寻找出准确的答案来。很多古城完全可以根据它的名称推测出它建立的原因。“堡”为过去官府派兵驻防之地。“寨”是民间以家族为主的村民自卫机构。清朝乃至于民国时期,保安大河流域的吴、季、李、脱被称之为“保安四寨子”,脱屯堡在民间称之为脱寨。据此,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,认为“脱家”系“脱寨”的土语方言转音或音变。而且“脱家”这一称谓主要流行于季、吴、李屯三寨子当中,并被他们广泛使用、广而传播。久而久之,“脱家”便成为兄弟民族对保安古城的固定称谓了。

说到这里,想必你也知道了“脱家”的真正含义了。如果还有人把“脱寨”音译为“脱家”的正确来源,误写为“妥加”或“托加”,不仅不妥当,而且是大大不妥。如果还有人把“脱寨”误解为“居住在高处的汉人或中原人”,那将是大错特错!

被淡忘的“榆谷城”

榆谷城位于互助滩东北边、西北边破拉扯河这么个范围内,民间称其为“塌城”。榆谷城规模及形状,史料记载模糊。其遗址尚存一段城墙及零星出土的陶罐瓦当而已。

榆谷城始建于西汉。据文史工作者考证,西汉宣帝神爵二年(前60年),赵充国在湟水流域“威服定羌”后推行屯田戍守,其后在互助滩筑榆谷城。被赵充国带到边陲的屯垦者们,在榆谷城繁衍了一代又一代。他们远离中原,真到了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的地步。时光回到了唐文宗开成四年(839年),这儿发生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大地震,榆谷城北临黄河的野雀峡山体滑坡,黄河支流保安大河被阻截后,迅速形成了堰塞湖。随着水位的不断上升,榆谷城逐渐被湖水淹没了。劫后余生的人们把目光放在了西南方向的那座地势较高的山头上。没过多久,人们在铁城山麓上用红沙土夯筑起了周长870米的城墙,并陆续建造了遮风避雨的房屋。新筑的城池高耸入云,山崖峭壁上有大雕垒筑的巢穴,人们便把新筑的城堡叫“雕窠城”了。

榆谷城淡化始于被堰塞湖淹没后改迁到铁城山,雕窠城逐渐替代了榆谷城。《新唐书兵志》记载,“天

宝十三年(754年)哥舒翰派兵攻占雕窠城,于其地设振武军……”尤其是明初设保安站以及清雍正八年(1730年)设保安堡军营、雍正十年(1732年)建中军都司衙门后,在官方文书及日常公文中频繁使用行政单位“保安”所致。

那么,榆谷城真的被人们彻底遗忘并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吗?

榆谷城早已被后人所遗忘,但它却以另一个符号顽强地存在着。据青海师大教授吴均先生指出:一些地方史料中出现的“一公”城、“移公”城即为“榆谷城”的土语方言转音。“热贡”亦为“榆谷”的土语方言转音(《同仁县志》)。一直以来,我诧异于“热贡”之称谓。查寻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及其他工具书,只有“热狗”并没有“热贡”一词。由此证明,“热贡”即不是汉语词汇,也不属于少数民族固有词汇,却是“榆谷”的转音或变音。

榆谷城被保安城替代很好理解,那么“榆谷”什么时候变成“热贡”了呢?这是因为榆谷城被废弃后,自唐朝筑雕窠城、明朝筑保安城,保安一直是地区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这一区域中心位置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。不管官方史料中如何承接榆谷城——雕窠城——保安城的历史变迁,自打明清以来民间便以榆谷的转音或变音“热贡”来表述这一区域范围,榆谷城仍顽强地活在历史当中。

被误导的“营务人”

和朋友们讨论保安史话的时候,有人对“营务人”这个名词提出了疑问。说保安族有人把自己的先人称作是“营伍人”,是元朝保安地区真正的“管理者”,这种提法是否正确?

说清楚这个问题,必须追根溯源其身世来源,抽丝剥茧查找其社会定位,如此这般才能真相大白。

首先要说明的是,保安的汉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成为了本地原住民。他们先是居住在互助滩的榆谷城里,后来迁到了铁城山的雕窠城里,再后来搬到了烟墩山下的保安城里。这段历史是任何人不容篡改的。

据史料记载,公元十世纪二十年代初,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蒙古诸部后,进行了大规模的西征。随着蒙古大军尽占西北各地,榆谷地区自

然而被纳入到了其管辖区域。为保障从西北地区进攻南宋,蒙古大军在沿途征调了大批汉族工匠,同时将一批被俘的西域色目人(即蓝眼睛人)和中亚撒尔塔人当中的工匠押解过来,组成了蒙古西域亲军(后勤部队)。这支被后人称之为“技术营”的工匠们,随蒙古军官吐索龙率领的探马赤军进驻榆谷地区,驻扎到季屯执行驻防与后勤保障工作。

在此需要指出的是,驻防的军队是由蒙古军官吐索龙手下的探马赤军,混编的工匠,尤其是战俘工匠是其监视和奴役的对象。据此我们不难理解,蒙古大军西征时缴械投降的战俘还能以“营伍人”的身份自居吗?丢掉了营伍军人的身份,然后被占领军强制押送到异地强迫他们作后勤工作,这样的一群人还能称其为“营伍人”吗?其正确的身份应该是——在军营强制劳动并为军队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,简称“营务人”。

“营务人”被正视后,所谓“管理者”的说法不喻自明。

大量被征调的汉族工匠和解除武装的战俘人员组成的“技术营”,在蒙古探马赤军的督促下很快就向前线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弓箭、战刀、马掌、马鞍、被服等军需品(保安腰刀的锻造工艺与技术成熟就是源于此时),有力地支持了蒙古大军行军作战。1259年,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,遂将“营务人”与探马赤军一起编入民籍就地驻扎屯垦。允许“营务人”娶妻生子,成家立业,成为真正的“民户”。从这时起,这支混编的“技术营”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元朝及其后的有关史料上“兵农合一”的提法只是个体面的称谓,名不副实。其实“兵农合一”之中的“兵”是指蒙古军官吐索龙率领的探马赤军,所谓的“技术营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士兵。探马赤军是正版的“军屯户”,“营务人”是贴牌的“军屯户”。有些人据此为实,将自己视为真正意义上的“兵户”是一种掩盖战俘真实身份的体面表现。因为沿途征调的大量汉族工匠不同,从西亚、中亚强制押送来的战俘数量较少,他们的政治身份是俘虏,是被管制,被监视,被奴役的对象,所以他们的政治地位很低。即使蒙元统一全国,赦免了这些战俘,使之成为了笼统意义上的军屯户,那也是“匠籍”,并不拥有“军籍”。蒙元统治者不可能让一群“匠籍”人员管理一个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中心,这是常识。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这群曾为蒙古大军提供后勤保障的“技术营”破格编入军屯户确实得到了较好的待遇,不仅让他们娶妻生子,还让他们“匠籍世袭”,并且他们的户籍由军事机关掌握而不入地方籍册。其实,“技术营”的户籍交由军事机关掌握,目的是便于管理这些人员;“匠籍世袭”是为了军事需要,一旦边防发生战事,这群人可以立即组成“技术营”为军队提供后勤服务。他们服从或服务于元朝军队,并不担当“管理者”的角色。

再有就是,这些数量较少的从西亚、西域被俘后强制押解过来的工匠们来到榆谷,他们不可能携带妻小,这也是常识。



上世纪80年代城内明清时代商铺街遗迹。

赵云才摄